

中國地方社會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但行走於中國鄉村，立即就可以發現單純從儒教治國意識形態來理解中國社會的局限性。古正美的研究表明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民間信仰所能承載的內容。那麼佛教在中國作為一種治國意識形態，除了文中已經討論的不同發展階段和傳統之外，這些教義是通過怎樣的制度、禮儀和機制如何來教化其信眾，並如何深刻影響中國地方社會所呈現的面貌，則尚待討論。但缺少了這部份內容，教化就沒有其實質意義。在這一層面，《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形態研究》還只能說是一個開始，但這樣的開拓性又恰恰是該書的重要性所在。

謝曉輝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By STEVEN B. MIL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x, 450 pp.**

近年來，區域社會史的一個共同關注中心是文化象徵的建構過程，通過探索過去文化觀念的形成和演進來解構觀念和記憶的權威性，以此理解當時真實的社會文化狀況，體現出新史學的研究取向。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麥哲維（Steven B. Miles）的這部新作正是此研究路向的又一優異之作。本書圍繞清代廣東書院學海堂的建立和發展過程，探討處於邊緣地位的廣東學者如何通過一次外來學術傳統的傳入，確立他們在當地學術文化圈中的精英地位。

書名“*The Sea of Learning*”中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本書的研究對象——作為實體的書院「學海堂」，二是本書研究對象所呈現出來的特點——精英和學術像「海」一樣的流動性：這包括從江南到廣東的文化流動，以及文人學者從浙江、福建和廣東珠三角腹地遷徙到都會城市廣州的社會流動。另外，學海堂本身也充滿了作為文化象徵的彈性，它在傳入廣東的過程中作出調整，適應地方社會，成為當地士子競爭文化資源的工具，在新的工具出現之後，又變成後人緬懷19世紀廣州文化全盛時期的標誌性符號，在實體之外其附着的意義是多元而豐富的，像「海」一樣沒有固定的形狀。如果無法全面理解題目的深層含義，忽略學術、文化精英和身份認同之間的

彈性和互動關係，讀者就難以進入作者所要論述的19世紀廣州都市世界。

本書分為導言和八個章節。開頭以1817年廣東士子梁序鏞上京赴考遭到譏諷的屈辱經驗和1855年廣東學者桂文燦編寫《經學博采錄》的例子展開討論。作者指出，在不足50年當中，廣東由地處南疆的文化邊緣省份成為北京、江南之外的另一個學術中心，並培養出一批具有強烈自信和精英認同感的士子，乾嘉時期著名漢學家阮元在道光五年（1825）於廣州城北粵秀山創辦的學海堂無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作者並非要進而探討學海堂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把這所書院置入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中，考察來自江南的學術傳統在移植到廣東時所發生的變化，解釋它為何會對一個特定的人文群體產生強烈的吸引力。第一章首先從地域上把19世紀的廣東分成都市（urban）和珠江三角洲腹地（hinterland）兩個對立的世界，並考察兩地學者在定居方式（settlement pattern）方面的差異。作者指出，居住在廣州城中的主要是「新來者」（new comer），與當地並無密切的宗族關係；與之相對的是大良、九江等珠三角腹地的學者，他們多為當地世家大族的子弟，強調自己和明代廣東理學精英的聯繫。兩地學者不同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對待學海堂的不同態度，都市新來者為了競爭文化資源，彌補自己在宗族關係上的不足，自然比西江流域的本地學者更熱烈地擁抱新的學術傳統。在第二章中，作者從時代的角度分析學海堂為何在19世紀的廣州受到廣泛歡迎。通過廣東文人謝蘭生的日記，作者詳細地描繪了嘉道時期的文人交游網絡，並指出當時商人和文人之間關係密切。作者認為，謝蘭生以及其他學海堂第一代學者是19世紀廣州最後一批尚未被學海堂改變的文人，從他們的日常飲食活動和詩文唱和中可以獲得一個印象：當時的廣州已經處在一個正在發生變化的時代中，人們對書院、文社、出版等文化事業的興趣大大增加，商人熱衷於贊助學術，更重要的是，外地的移民學者迫切需要獲得一個可以在都市中安身立命的精英身份。與其說學海堂改變了19世紀的廣州，不如說它順應了社會的需要，在多種因素的促成下應運而生。

這兩章的重要貢獻在於打通了思想史、教育史和社會文化史之間的藩籬，從地域與時代的角度為精英身份的獲得和學術路數的取向建立了一個分析框架。作者在兩個方面和以往的學海堂研究構成對話關係。一是從思想史到社會文化史的轉變。以往的研究多是關於學海堂如何把廣東從文化沙漠「改造」成文化中心，而作者則注重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呈現學海堂所處的世界和創建的年代，呈現社會文化生活中層層迭合的複雜關係，如果沒有廣東當時的文化基礎以及外來精英競爭文化資源的需要，學海堂所推廣的學術

思想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廣泛接受，相比起它在思想史上的價值，社會史的意義在以往的研究中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二是不少研究者經常談到學海堂的「入粵學者」在廣州文化建設上作出的巨大貢獻，作者的研究卻讓人重新思考何謂「入粵學者」。他所定義的「入粵學者」並不僅僅取決於地域上來自廣東以外的省份，或者是否已經取得當地的戶籍，而主要是觀察其是否認同自己和明代廣東理學精英的精神聯繫。因此，不但福建、浙江商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孫，許多生活在廣州多年的旗人、粵東嘉應地區的客家學者等也都是作者筆下的「外來者」。這也是過去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的。

第三到五章考察了學海堂的創建、發展以及在危機中的重建經過。第三章追溯學海堂第一代學者的地域背景，並探討書院的課程設置特點，例如對蕭統《文選》的推崇，以及季課制、學長制、刊刻制等一系列制度，進一步確定它在學術路數上與江南漢學傳統的密切聯繫和對明代理學的疏離。第四章檢視學海堂學者編修的三種地方文獻：南漢史、詩歌和叢書。作者着眼於外來的考證方法在傳入地方時作出的種種調整和變異。第五章談及學海堂在19世紀中期遭遇的危機及其重建過程。雖然經歷了第一、二次鴉片戰爭，以及英法聯軍攻占廣州城的危難，作為文化象徵的學海堂一直屹立不倒，它繼續是外省移民在此間獲得文化精英身份的重要途徑。具體表現為阮元在19世紀早期所提出的「專課生」——即每個學生自選一種經典進行研習的設想，在此時得到全面推行。

這三章完整地呈現了一個都市機構（urban institution）的建立過程，延續了西方史學界關於都市機構和精英文化關係的討論，如近年來引起巨大反響的、韓書瑞（Susan Naquin）關於北京廟宇的研究（*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本書的特點在於細緻地重現一個陌生的都市機構在融入地方的過程中所採取的種種策略，例如重寫地方史，梁廷楠和吳蘭修用考證的方法重寫南漢史，他們在《南漢志》、《南漢地理志》、《南漢金石錄》中對南漢的金石、地理等詳加考證，不再對其統治的合法性作出道德評判；又如《學海堂集》中的詩歌很多以嶺南佳果作為詩題，以佳果喻名士，培養學生在文化認同上的自信，這些詩歌的題材意義超過了它們的藝術技巧。同樣地，在編寫大型叢書時，珠三角腹地學者和學海堂學者也表現出不同的學術取向，大良宗族學者羅學鵬編寫的《廣東文獻》着眼於前人的品行功德，而作為「外來學者」的一員，譚瑩在《嶺南遺書》中通過序言、夾注、訓詁等手段解讀前代文獻，體現出理學到樸學，從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的趨勢。在論述江南的學術傳統本地化的

過程中，作者最重要的貢獻是指出移民的「文化創造」。他認為，相比起珠三角腹地學者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優勢，都市的外來學者缺乏血緣上的宗親關係（genealogical lineages），因此着力於構建一個文化和學術上的宗族（scholarly and literary lineages）與之抗衡。在這個過程中，學海堂作為都市機構的文化象徵意義得到了全面的實現。

第六、七章是兩個個案分析，對象是19世紀公認最杰出的兩位廣東學者——陳澧和朱次琦。雖然他們同樣被認為質疑漢學，提倡「漢宋調和」，但具體的學術取向卻因為他們各自的身份不同而迥異。陳澧的祖先是從江南遷居到廣東的衙門「師爺」，和眾多借助江南學術傳統和學海堂獲得精英身份的外來學者一樣，陳澧一直強調自己的原籍身份，雖然他不滿考證對文本道德意義的忽略，但大多數的批評只保留在手稿中，不願付之印行。相反，朱次琦作為西江流域世家大族的一員，雖然被邀請到學海堂讀書甚至擔任學長，但本身的地位和資源決定了外來的學術傳統無法對其產生吸引。朱次琦堅持自己的九江身份，拒絕居住在廣州城，對學海堂的考證方法和廣州城中泛濫的出版業提出了真正激烈的批評。陳、朱的對比反映出都市／腹地學者之間的分野在學海堂建立之後越加明顯。

在結論部份的第八章，作者為學海堂作為文化資源競爭工具的研究畫下了一個饒有意味的句號。這一章講述19世紀末廣州一個移民家庭的一對兄弟在20世紀的生活軌跡。大哥汪兆鏞生於1861年，他和大多數外來學者一樣通過學海堂成為文化精英，並在20世紀學海堂結束之後仍然保持「遺老」身份，自稱是廣東文人文化的守護者。而比他年幼22歲的弟弟汪兆銘，雖然少年時代過的是和哥哥相似的生活，但世易時移，舊式書院作為文化資源競爭工具的時代業已結束，精英身份的獲得需要採取一種全新的手段。舊式書院畢業的汪兆銘得到一個留學日本軍官學校的機會，繼而參與孫中山革命，暗殺清廷要人，最後在日本侵華時期「落水」，他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汪精衛。至此，新的社會流動方向和新的文化資源競爭工具登上歷史舞臺，學海堂作為都市機構的實用性功能宣告結束，成為後世文人緬懷廣州文化全盛時期的標誌性建築，它在詩歌中頻繁出現，通過文本成為真正的過去，最終完成了一個文化象徵符號的建構過程。

本書以學海堂為中心，描述歷史文化資源對於構建一個時代精英身份認同的重要作用。其研究範式上最大的特點是在社會史研究中引入人類學的視角，用歷史過程解釋歷史關係。作者擅於運用細密、詳盡的敘述方式抽絲剝繭地呈現出事件背後層層迭迭的歷史細節。另外，作為一部嚴謹的史學

著作，作者的文學修養令人贊賞，尤其是在每章開頭以及行文中穿插的中國古典詩文的英譯，體現出在中英文語體轉換上高超純熟的技巧。在史料運用上，不但大量使用族譜、方志、詩文集等常見材料，更通過謝蘭生的《常惺惺齋日記》中飲宴唱和的網絡，以及沈復《浮生六記》中關於沙面花艇的章節等重現19世紀的廣州都市景觀，這些都是一部歷史著作中非常生動別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讀罷本書的一點餘思是，作者對19世紀廣東文化精英的社會流動和身份認同的研究是從地域和宗族角度出發的，尤其是談及九江學者朱次琦時，作者認為朱以「九江」為「號」是別有深意的，表達了朱次琦對自己九江身份的重視。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文士以出生、居住或任職的地名為號並不少見，例如「賈長沙」（賈誼）、「韋蘇州」（韋應物）、「柳柳州」（柳宗元）等，相比起陳澧的「憶江南館」，「朱九江」所承載的身份認同意義似乎並不十分明顯。究竟「九江朱」是一種過度闡釋，抑或其實在中國古代以生地或任職地為自己命名的傳統中早已包含了身份認同的意味，並有可能進一步從地域、學術、身份的角度加以剖析，這是很值得後來者探尋的。

黎恩

中山大學中文系

周建新，《動蕩的圍龍屋：一個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與文化抗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2，3，3，456頁。

尚未開卷，《動蕩的圍龍屋：一個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與文化抗爭》一書的封面即給人以視覺上的衝擊：一座古樸的圍龍屋在高樓大廈的包圍和逼視下頑強地屹立着。這幅圖景巧妙地提示了本書的主題，即在現代化城市建設與歷史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作為客家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象徵的圍龍屋如何生存和發展。

圍龍屋是客家人聚居地區的典型建築，被譽為中國五大傳統民居建築之一。隨着時間的推移，圍龍屋日益失去了最初的一些功能，然而其特殊的文化意義和象徵價值，使得它依然在客家人心目中佔有很高的地位。位於粵東K城城中村——鍾村的壽山公祠就是這樣一座圍龍屋，自建立三百多年以來，它既有過熱鬧輝煌的場面，也有過冷清肅靜的經歷。2003年3月，一紙突如其來的拆遷公告宣布這座古老建築的滅頂之災。這個祠堂的擁有者鍾姓人奮起